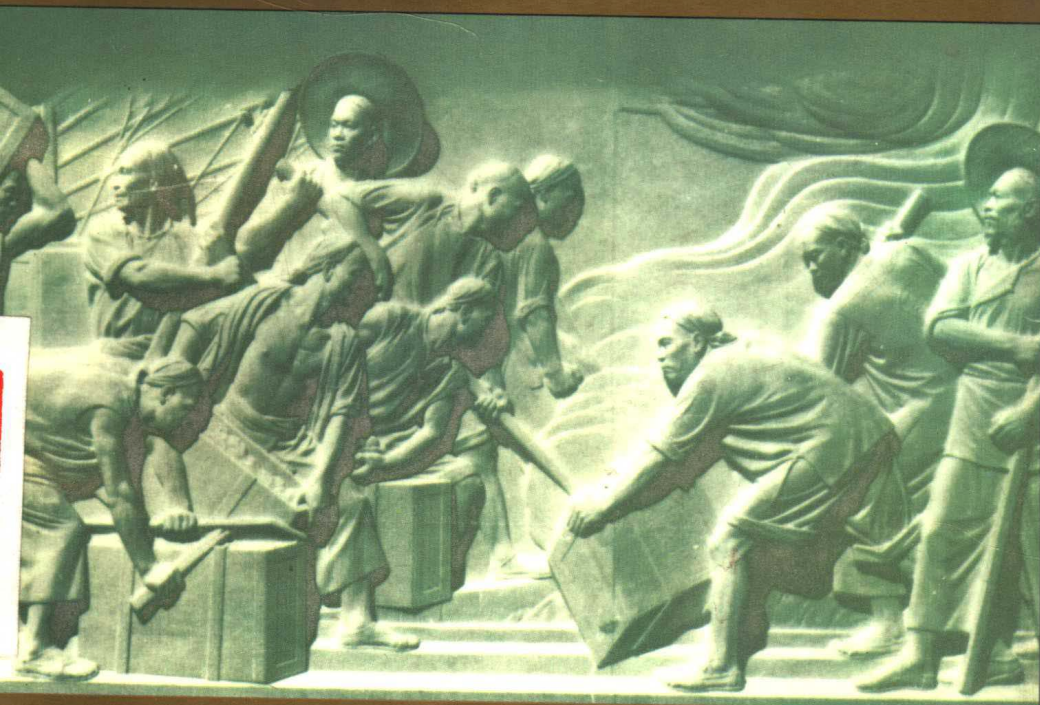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李鸿章张树声刘铭传

诗文选译

● 尹福庭 ●



巴蜀书社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李鸿章张树声刘铭传
诗文选译

尹 福 庭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责任编辑：谢艺波

封面设计：李文金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李鸿章张树声刘铭传诗文选译

尹福庭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60 千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80523—816—2/1·332

总定价：460.00 元（共三十九册）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主 编：戴 逸

副主编：杨东梁 段文桂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汝丰 王俊义 牛仰山 冯 杰

孙 静 李 侃 杨天石 杨东梁

杨宗义 张我德 胡绳武 郭毅生

段文桂 段志洪 龚书铎 程 歆

戴 逸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编）

序 言

戴 逸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采，它的意义，比得过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

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悱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概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带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颠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锋颖凜凜”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们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

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骛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裁，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无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邱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

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前 言

本书选译了晚清洋务派人物李鸿章、张树声、刘铭传在洋务运动中的若干著述。洋务运动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逼迫下，出于对内镇压和对外御侮的双重目的，掀起的一场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是以学习和采用西方的物质文明为主要内容，根本不想触动封建的政治体制和纲常名教，因而也未能真正挽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但毕竟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使封建落后的中国增添了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并从而产生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为尔后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和革命运动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对促进中国由封建主义向近代化的演变，无疑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李鸿章、张树声、刘铭传都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特别是作为洋务派首领的李鸿章，则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本书因限于篇幅，仅侧重节选了他们在这场运动中部分有代表性的书信和奏折，其中包括有关洋务指导思想、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创办、洋务教育的兴举以及对外战争的主张和表现等，

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选文的思想内容，现对原作者的生平、思想、著作做一简要的评介。

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早年曾受业于曾国藩，讲求义理经世之学。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授编修。1853年（咸丰三年）奉旨回籍办团练，后入曾国藩幕。1862年（同治元年）奉曾国藩之命组建淮军赴沪，参与对太平军作战，升江苏巡抚。他利用上海饷源充足的条件，在英、法、美侵略者的支持下，大量购置洋枪、洋炮，雇用外国军官，装备和训练淮军，会同英国人戈登的“常胜军”，先后夺占苏（州）、常（州）一带，有效地配合和保障了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今南京），以功封一等肃毅伯。1865年署两江总督。次年，继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河南一带“剿捻”。旋授湖广总督。先后在弥河和徒骇河之间镇压了东、西捻军。1870年，又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不久，授内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参与掌管清政府的军事、经济、外交大权长达25年之久。其间，在军事上，他参与派遣了数批留学生赴欧、美学习军事和科学技术，并在国内创建了一批军事学堂和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北洋水师。经他直接指挥和参与的军事行动，有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在经济建设上，他创办了一批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有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由他接办扩建）、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漠河金矿、上海织布

局等，中国近代最早的铁路，也是在他的建议和支持下修建的。在外交上，他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多中外交涉，天津教案、琉球事件、中日建交、马嘉理案、中法新约、马关条约，都是经他参与，由他出面签订的。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因甲午战争对日作战失败，李鸿章被解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至此，由他参与并积极倡导的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也逐渐地为新兴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维新运动所代替。此后，李鸿章虽然失势，但清政府在外交上仍不得不借重于他。1896年，清政府出于联俄抗日的目的，派他参加俄皇加冕典礼，并命他出访欧、美。经奏准，他在访俄期间，同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1899年出任两广总督。次年八国联军侵华，他力主镇压义和团，支持“东南互保”，后被任命为全权大臣，并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职务，与庆亲王奕劻代表清政府同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次年11月7日病卒，谥“文忠”。

从上述李鸿章的生平简介，可以知道他一生的大半经历是办理洋务，其洋务思想的萌发，是他到了华洋杂处的上海之后开始的。他到上海不久，就表示对洋枪洋炮十分佩服，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炮真神技也。”^①对洋枪洋炮的效用，曾国藩开始还不十分相信。李鸿章在书信中竭力说服他的老师。他说，外国兵少而强，中国兵多而弱，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枪炮靡滥”。又说，同洋人打交道既难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欽手。”他还以俄国、日本为例，说他们本来很弱，就因为“以

^①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第20页。

前不知炮法”，自从他们“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利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并且表示：“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①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在上海首先使淮军初步西化，并创办了三个小型洋炮局，仿照洋法，制造炮弹和短炸炮等西式武器。

当湘军攻陷天京后，他认为，太平军的余部已不足平，“有健将数人，劲兵数万，当足了之”。于是，他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对外。1865年，他就发出“千古变局”的呼吁，说：“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忘人不知，而秉钧执政者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②这表明他已深深地感到，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社会地位已岌岌可危，若不及时“求富强”，将不能“自立”于世界。那么，怎样才能求富强呢？在李鸿章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所缺少的是西方的科学技术，求富强就在于“取外人之长技，以为中国之长技”，^③而眼前的急务是变易绿营兵制，讲求军队的武器装备。事实上，早在攻陷天京几个月后，他就建议：绿营兵应“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为整”。“海口各项艇船、师船概行屏逐，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可恃”。^④为此，也就在他发出“千古变局”的这一年，即在上海购得美国人旗记铁厂一座，将原设上海的两个洋炮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他在给

①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第47页。卷3，第16—17、19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六，第37页。

③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第35页。

④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第34页。

朝廷的奏折中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铸造枪炮借充军用为主。”^①实际上，江南制造局成立以后，除了铸造枪炮外，从1868年起至1885年止，还制造了八艘轮船。与江南制造局成立的同时，他又将移至苏州的另一洋炮局迁至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主要制造大炮，兼及枪、弹、火药。1870年，他调任直隶总督，又接办了原由崇厚创建的天津机器局，经他整顿和扩建，为了与江南制造局相配合，主要生产子弹、炮弹和火药。以上几个制造局，加上左宗棠于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成为中国早期军事工业的主干。在它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国许多省份也都先后以“制造局”、“机器局”的名义相继设立了军火工厂。

60年代，李鸿章是以创办军事工业为重点。从70年代起，他又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办起军事工业以外的民用企业。一是创办电报、铁路和轮船招商局。他认为，交通运输和电报事业，不仅于“富国”有重要意义，而且是“强兵”的必要手段。1872年，在他主持下，为了收回长江外海航运利权，并加强中国在军事上内外联络的能力，创办了轮船招商局。1879年（光绪三年）冬，他在大沽、北塘炮台试架电报线以通天津。至1881年津沪陆线建成，使南北洋讯息相通，于军务、商情大为便捷。此后，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除沿海各要地间均已建成陆线外，内地各主要城市间，也陆续建立了电报联系。至于铁

^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第34页。

路的兴建，由于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进展则十分缓慢。自1881年建成唐山煤井至胥各庄10公里铁路后，直到1893年才修通了天津至山海关的陆段。尽管为数甚少，但多少也增强了沿海军用运输的能力。二是采用机器开矿、织布。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原材料供应，特别是煤铁的供应，就成为突出的问题。正如李鸿章所说：“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①为此，1881年在他的主持下，建成开平煤矿投入生产。这是我国最早用机器开采的一座大型煤矿，至1894年每日可产煤达2000吨，原计划还有炼铁，因资金不足停办。1889年，他又联合黑龙江将军恭镛建成漠河金矿投入生产，成为仅次于开平煤矿的成功企业。李鸿章创办漠河金矿不单是为了开发财源，用他的话说，也是为了“实边”，以阻遏俄国人对我国东北边疆的“蚕食”。1890年，为了抵制洋布在中国的倾销，又建成上海机器织布局，正式投入生产。该局拥有轧花、纺纱、织布全套机器设备，纺锭3.5万枚，布机530台，雇用工人约4000人。投产后，营业兴盛，利润丰厚。李鸿章从创办军事工业转向创办民用工业，如他所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国本乃可益固。”^②这说明他已认识到军事应以经济为基础的道理。尽管他创办的这些民用企业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并且多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不可避免地把官场的腐败带进了企业管理，致使这些企业的成效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在“以土产敌洋货，力保中国商民自有之利权”方面^③，还是起了积极

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第46页。

② 同上书，卷四三，第43页。

③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七，第38页。

作用的。

李鸿章为了富国强兵，在积极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同时，还重点抓了军队的建设。如不断更新淮军的武器装备，用西法训练淮军，尤其是在 1888 年，还建成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北洋海军，并建成旅顺、威海卫两大军港，形成对京畿的钳形防御网。有关他在这方面的著作，《丛书》另有专题选译，这里不赘述。

举办各类洋务事业，人才为首要条件。李鸿章认为：“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①“肄习西学，培养人才，实为自强根本”。^②他培养洋务人才，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派遣留学生到海外培训。1871 年，他会同曾国藩奏准选派幼童赴美国留学。1876 年又由他奏准选派淮军中下级军官赴德国学习陆军。次年，又会同沈葆楨奏准选派福州船政局前后学堂学生赴英、法学习轮船制造和驾驶。二是聘请外国教习，在国内举办西学堂。早在 1863 年，为了培养翻译人才，他在上海就设立了外国语言文字馆。后该馆归并到江南制造局，改为广方言馆，并聘请外国传教士会同中国科技人员翻译了相当一批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此外，又在江南制造局附设了一些技术学校或短期培训班，以培养急需的技术人才。为了使从事西学的人学成后能有出路，1864 年他建议在科举考试中“专设一科取士”。^③1874 年又在《筹议海防折》中进一步呼吁改革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他说：“军务肃清以后，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末由进身，而以章

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第 45 页。

② 同上书，卷 53，第十六页。

③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五，第 4—10 页。

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他建议：（一）、在“科目”中废弃“小楷、试帖”，变通考试功令，“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二）、“凡有海防省份，均应设立洋学局”，以造就西学人才；（三）、效法西方以西学作为“黜陟人才”的标准，对学有成效者“奏奖升阶”，使其“与正途出身无异”。^①但是，他的这个建议却遭到守旧势力的斥责。他们攻击李鸿章是“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②朝廷的最高主政者，对他的这个建议也始终未予认真考虑。不得已，李鸿章只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北洋范围内先后创办了一批西学堂。1880年创办天津水师学堂。1885年创办天津武备学堂。在此前后，又在天津、旅顺、威海、大沽、山海关等地，创办了一批管轮、驾驶、鱼雷、水雷、枪炮、电报、西医等专业学堂。这些学堂，为晚清的海陆军建设培养了相当一批急需的将佐和军事技术人才。至于学生的功名和出路，开始只争得照京师同文馆之例，两年一奏保升阶。但这种办法，在当时科举制度尚未废除而朝廷任官又重科甲正途的情况下，对发展洋务教育是很不利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888年由于李鸿章的力争，朝廷才准许天津水师、武备学堂的教习和学生参加了顺天乡试。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把西学引进科举，实行中西学同考，其革新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李鸿章对内倡导“自强”，对外则力主“和戎”。早在上海时，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就提出“外敦和好，内要自强”。^③后

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第23—24页。

② 《洋务运动》丛刊（一），第129—130页。

③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第26页。

来，又在给王闿运的信中将其概括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①他所以对外力主“和戎”，其理由有二：一是他认为，“彼（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②二是他认为“自强”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苟动为外人牵制，则中国永无自强之日”。^③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把“和戎”视为最高的指导原则。每当中外冲突初起，他总是幻想通过外交手段，利用“以夷制夷”来消弭战端，而不做积极的战争准备。当战争起来以后，他虽然也讲“不宜轻于言和”、同敌人“持之以恒”等类的话，其目的仍是以战为和，即以战争作为手段，只要能达到“和款可无大损”，就应该及时“言和”，并没有同敌人真正打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因为他很清楚，战争长期打下去，最终对清王朝是不利的。1884年中法战争，他力主“乘胜即收”，造成中国不败而败，就是他上述思想的具体体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初起，他幻想依靠俄、英调停，避战求和，而贻误了战机，再加上当时清政府的腐败和政治经济落后，结果招致战争惨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至于有关李鸿章在外交和对外战争方面的著作，因本书篇幅有限，仅选译了几篇有代表性的书信、奏折和电报稿，虽然不够全面，但从中也可略知他在这方面的主张及其表现。

李鸿章晚年，其洋务思想稍有变化。他在欧、美考察期间，除了重点考察西方的物质文明外，对西方的政教制度也有所领

① 同上书，卷十九，第2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第12页。

③ 同上书，卷三九，第2页。